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 德美关系研究

魏光启

摘 要：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呈现一种基调未变、自主性增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德国继续将北约视作本国安全的基本工具，在美国和欧洲大陆盟国间维持一种稍微“亲美”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随着安全情势的整体好转，德国基于本国立场，逐步构筑一种相对独立、扩大发言权的同盟战略姿态。在同盟内部，历任德国总理都重视同美国维系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域外行动问题上，德美关系也曾纷争不断，甚至严重恶化，其负面效应尽显。德国的北约战略处于一种本国诉求提升、能力略显不足而又依赖于美国的有限运作空间，德美安全关系继续保持一种美国占据主动权的不均衡态势。

关键词：德国； 北约； 北约战略； 德美关系

作者简介：阜阳师范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安徽阜阳 236000

中图分类号：D85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4)01-0030-14

后冷战时代德国的北约战略不仅继承了冷战时期的基本内涵，而且融合了时代发展的新变化。重新统一和冷战结束为德国提供了百年未有的安全机遇期，困扰德国的紧要安全威胁一去不复返了。1994年德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指明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层目标：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作为欧洲安全的核心，德国应致力于在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维持持久的同盟；在统一的欧洲与北美之间建立享有平等权利的伙伴关系，突出北约的作用。^① 在《白皮书》的指导下，德国领导人的卓越远

^① 吴学永：《德国安全战略的新发展》，载《欧洲》，1996年第2期，第41-47页。

见推动了德国北约战略的延续性。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三位总理都难以割舍他们与北约之间的稳定关系。北约与美国结成的安全纽带是德国同盟策略的首要内容。接受美国和北约的领导可以预防来自德国东部的危险、欧洲大陆的猜忌，塑造德国的大国地位。

整体上看，冷战后德国政府的北约战略改变了德国冷战时期在东西方阵营作为“平衡者”的角色，换成努力在大西洋两岸维持相对“均衡”的角色。与此同时，德国的现实境况决定了它不甘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时受限制的行为体。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逐渐显现出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迹象，尤其当需要就和平与战争问题作出决策的时刻，它希望其他盟国（特别是美国）听取德国的声音。德国同盟战略开始展现出一种新的“自信”、“解放”、“正常化”及“独立性”倾向。^① 单从诉诸手段上看，德国最初以软实力为主，此后由于逐渐取得了国内民众、同盟国及国际社会的信任，慢慢转变为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即所谓的巧实力，以此实现对外政策目标。^② 这一转变难以规避它与同盟“老大”美国之间的矛盾纷争。

一、科尔政府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

德国统一后科尔政府在安全与防务政策上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推行传统的克制政策，还是利用新获得的行动自由实践更加自信的权力政治。^③ 采取权力政治不太符合德国当时的实际战略选择，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主动为之的自由姿态大大超出了德国在冷战期间的战略实践。应该说科尔政府在安全与防务政策、特别是北约战略的选择上还是极为谨慎的。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德国北约战略的延续性比较明显。首先，科尔政府继续将北约看作德国自身安全的首要依托。其次，同美国保持合作大于分歧的关系。无论是老布什提出的“领导层的伙伴”(partners in leadership)^④关系，还是与克林顿的亲密接触，科尔政府始终与美国保持积极的同盟关系。再次，克制战略得以延续。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抛弃冷战时期的克制战略。科尔深知如果抛弃这一战略，德国将再次陷入令欧洲大陆、尤其法国感到恐惧和不安的情势。为了安抚邻居，科尔主动加强以法德两国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同时，在北约的多项域外行动中，科尔延续了“支票外交”的做法——为盟国提供大量的军事、经

^① Tuomas Forsberg/Graeme P. Herd, *Divided West: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London: Chatham House, 2006, pp. 65-66.

^② William R. Patterson, "Smart power in reunified Germany", *Journal of Power*, Vol. 1, No. 3 (December 2008), pp. 339-354, here p. 339.

^③ Susanne Peters, *German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rriving at a New raison d'état?*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York U., Toronto, Ont., May 1994.

^④ William R. Smyser, *Germany and America: New Identities, Fateful Rift?*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3, p. 44.

济援助,但却竭力规避本国军队直接参与域外军事作战行动。

科尔政府的战略选择不仅体现在延续性上,还表现为一定的变化性。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在安全防务及综合实力上均处于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有利位置。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快速“舶来”的“战利品”,科尔毫不掩饰地强调德国需要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大的角色,承担新责任”。^①与这种理念相伴的是,历史“包袱”始终萦绕在德国民众之中,这使得科尔在做决策时流露出一种自身抱负与外部限制的“复杂情感”。因此,科尔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是推动德国逐渐回归到常态(Normalcy),这意味着德国应被置于西方文明和欧洲-大西洋机制的心脏位置,发挥中心作用。^②按照科尔的理解,冷战时期,德国处于苏联领导的欧亚势力范围和美国领导的欧洲-大西洋体系两大中心的中心,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德国发挥了平衡者的作用。冷战后,除了继续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谋求平衡外,德国更应在跨大西洋同盟体系内,尤其在欧洲与美国之间权衡,逐步获得塑造同盟战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具体策略领域,德国的实际行为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是突破《基本法》的限制,将军队送出国门,参与同盟及联合国的相关行动,从先前静观事变和提供财政经济支持转变为主动出击,甚至干预;二是加速法德和解的进程,在欧洲一体化范围内深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力度,在安抚法国及开辟多元安全与防务通道的同时谋求独立自主性。

宏观上看,科尔政府的同盟战略没有改变德国置跨大西洋同盟于首要地位的大方向。科尔深知,维持跨大西洋同盟的稳定关系事关德国的安全利益,因此他所采取的战略策略类似于“维持现状”——既没有将克制理念强加于欧洲盟国,也没有成为北约框架内构建能力投送计划的主导国家。不可否认的是,科尔的确利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行动,重组本国的军事资源,增强本国的能力。在同两个最重要的盟国——法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科尔同样没有颠倒它们之间的位置。他似乎更强调在美国领导的北约范围内发展德国的跨大西洋安全政策。^③换言之,如果用“平衡”继续指代冷战后科尔政府的北约战略,那么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或者法国和美国之间,德国谨守着一种略微偏向美国的、大致均衡的战略。

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维持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是德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德国不断调整其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方向,将其运用于德国未来发展的各项议程。科尔政府承认,发展跨大西洋关系不仅得益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历史,而且受惠于共同利益以及社会、政治及经济等联系。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之外的亲密盟

^① Henrik Bering, *Helmut Kohl*,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lishing, 1999, p. 144.

^② Michael Mertes, “Helmut Kohl’s legacy for German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Autumn 2002), p. 75.

^③ Susanne Peters, “Germany’s Security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 Taking the Wrong Models”, *European Security*, Vol. 6, No. 1 (Spring 1997), pp. 18–47, here p. 41.